



# DIGITAL ACCESS TO SCHOLARSHIP AT HARVARD

## Food and Memory: Rethinking Jian'an (196-220)

The Harvard community has made this article openly available.  
[Please share](#) how this access benefits you. Your story matters.

Citation	Tian, Xiaofei. 2010. Food and memory: Rethinking Jian'an (196-220). Zhongguo wenxue xuebao 1, no. 2010: 21-34.
Accessed	February 19, 2015 1:11:25 PM EST
Citable Link	<a href="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11130528">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11130528</a>
Terms of Use	This article was downloaded from Harvard University's DASH repository, and is made available under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applicable to Open Access Policy Articles, as set forth at <a href="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dash.current.terms-of-use#OAP">http://nrs.harvard.edu/urn-3:HUL.InstRepos:dash.current.terms-of-use#OAP</a>

*(Article begins on next page)*

## 宴飲與回憶：重新思考建安

田曉菲  
哈佛大學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建安：一個是東漢末年作為政治時期的建安，開始于公元 196 年，結束于公元 220 年；另一個是具有傳奇色彩的文學史階段，構成中國古典詩歌真正源頭的建安。一切源頭都是後設，但是文學史上的建安在不止一個意義上是發生于事後的建構。在這個意義上，“重新思考建安”有雙重含義：一方面是對建安重新進行思考，另一方面是把建安當成“從來都已經是” (always already) 發生于事後的反思。作為文學史階段的建安，一開始就是在回憶中發生的：對已經去世的人、已經成為過去的事件的傷感回憶；在這一傷感回憶的中心，却是一場盛宴。

本文提出，作為文學時期的建安，本身就是一個文學創造，是一個充滿懷舊感的建構，而它所緬懷的經驗，只有在記憶和想像之中才達到完美和豐滿的極致。這篇文章所要探討的另一個問題，是為什麼飲食對於這份回憶如此重要。這僅僅是因為飲食是最感性和最個人化的人生經驗之一，故此就象法國作家普魯斯特所言，味覺和嗅覺能夠喚起過去的精髓？還是因為飲食，特別是集體飲宴，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社會性風俗制度，在帝國話語中起到了重要的文化和文學的作用？如果是後者，那飲食又是怎麼起到這種作用的呢？本文是對這兩個問題進行的初步探討。

### 一，瘟疫

“建安”的創造過程有三個重要的環節。第一個環節發生于公元 217 年之後不久。公元 217 年，也就是建安二十二年，發生了一場大瘟疫。在薄伽丘《十日談》中，十個青年貴族男女從瘟疫流行的佛羅倫薩城逃避到鄉下，在那裏講故事消磨永晝，瘟疫成為一百個愛情故事的背景和敘事框架。同樣，瘟疫和死亡，也為“建安”提供了一個黑暗的語境。

范曄（398-445）的《後漢書》對這場瘟疫有一個簡短的陳述：

“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大疫。”<sup>1</sup>

和公元六世紀席捲羅馬帝國的鼠疫或者十四世紀蔓延于佛羅倫薩的黑死病不同，我們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得到對這場瘟疫的任何詳細文字記載，更不用說視覺圖像方面的表現。唯一可以看到的是曹植（192-232）保存在宋代類書《太平御覽》中的《說疫氣》殘篇：

<sup>1</sup> 《後漢書》卷 17。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年第一版，頁 3351。

建安二十二年，厲氣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或以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耳。若夫殿處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門，若是者鮮焉。此乃陰陽失位，寒暑錯時，是故生疫；而愚民懸符厭之，亦可笑。

曹植顯然試圖保持樂觀的態度，並且用理性的分析對災難進行解說。但是，盡管他堅稱受到瘟疫影響的大多數都是“被褐茹藿之子，荊室蓬戶之人”，事實似乎並不如此：

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

這段話，來自曹植的兄長曹丕的一封信，寫信的日期是公元 218 年 3 月 18 日。徐、陳、應、劉自然是指徐幹、陳琳、應瑒、劉楨，曹操的下屬，與曹丕、曹植關係友善的士人。顯然，死亡並非只惠顧社會下層的“愚民”，也奪去了貴公子孫如曹丕者的親戚故交包括當世幾位最有文名的才士的生命。這對曹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據王沈（d. 266）《魏書》：

帝初在東宮，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內，講論大義，侃侃無倦。<sup>2</sup>

而瘟疫給中國文學史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建安七子”的創造，而沒有所謂的“建安七子”，無論曹氏父子三人多麼光輝奪目，也就沒有後人眼裏的那一個以“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為其特色的“建安”。在《典論·論文》里，曹丕挑選出七位當代士人，對他們作出至高的評價：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學，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

曹丕所舉七人，也就是知名後世的“建安七子”。但是，在西晉史學家陳壽（233-297）的《三國志》里，我們卻看到一個不同版本的“建安七子”：

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汝南應瑒字德璉、東平劉楨字公幹并見友善。……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楨二十二年卒。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

<sup>2</sup> 陳壽《三國志》卷 2，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 1959 年第一版，頁 88。

時俱逝……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自潁川邯鄲淳、繁欽、陳留路粹、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例。<sup>3</sup>

關於曹丕的七子為什麼沒有包括曹植而包括了比曹丕年長三十余歲的孔融，我們當然可以作出很多推測：孔融在當世的聲名；其家族背景在社會上具有的重要影響；曹丕對孔融文筆的真心愛好；不便于品評自家子弟；等等。<sup>4</sup>但是比起陳壽的七子，曹丕的七子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全都已經過世了；因此也就可以蓋棺論定，把這些作家奉為高不可攀的楷模。而這七人當中的五人，都死于公元 217 年。他們的死是一個重要的契機，促使曹丕對他們進行紀念，而紀念的方式，則是“撰其遺文，都為一集”。換句話說，所謂“建安七子”未必是在其生前，而是在七個人特別是作為常數的王、徐、陳、應、劉五人皆已作古之後，方始定型於曹丕《典論·論文》的。另外值得我們注意的一點，是陳壽在書寫歷史時，明確告訴我們在建安時期有很多文才出眾的士人，比如邯鄲淳、繁欽、路粹、丁氏兄弟、楊修、荀緯等等，但同時又明確指出，他們“不在此七人之例”。陳壽在史傳中特意提出“此七人”，並一一列舉其姓名，顯然和曹丕在《典論·論文》中開列的“七子”名單並對之加以大力推崇有直接的承繼關係。至于陳壽以曹植替換孔融，則恐怕一方面因為孔融的作品已經未必適合公元三世紀中後期的口味，另一方面也因為曹植身後的文學名聲愈來愈大的緣故。

創造出“建安七子”的另一份重要文件，是曹丕寫於 218 年 3 月 18 日的《與吳質書》。這封信和《典論·論文》一樣，充滿了沉思、傷感以及對死亡與不朽的焦慮，然而，在這些哀傷情緒的中心，卻是一份對歡宴的美好回憶。這封信奠定了建安文學的基調：

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調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冀壤，可復道哉。

歡宴定義了作為文學時期的建安；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歡宴從一開始就是作為記憶存在的，它從一開始出現就已經是一份永遠失去而且再也無法重復的體驗，一份永遠的缺席。在曹丕的信里，歡樂不是現在時，而是過去時，而且從剛一出現，就已經是過去時。

在評價了過世友人的才能和寫作之後，曹丕以否定的形式肯定了建安諸子的成就——

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

<sup>3</sup> 陳壽，《三國志》，卷 21，頁 599。

<sup>4</sup> 《後漢書》卷 70：“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每歎曰：‘楊、班雋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頁 2279。

七子雖然“未及古人”，但是還在世的同時代人已經“不逮”；來者雖然“難誣”，但曹丕已經“不及見”了。如此一來，曹丕把自己放在一個獨特的位置，在這個位置，他成為一個已經結束的輝煌時代的見證人。不僅他們的成就不可企及，就連他們的歡宴也已經變成不可重復的體驗了：

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

曹操的“日月之光”總是把曹丕籠罩在陰影里，他總是受到焦慮的煎熬：在成為王太子之前，他日夜焦慮自己是否會被父親選為繼承人；在成為王太子之後，他感到這個位置沉甸甸的份量。公元 217 年，是五子死於瘟疫的一年，也正好是曹操晉封魏王並加九錫的一年，更是曹丕被立為王太子的一年。在此之前，曹操曾經在曹丕和曹植之間長期猶豫不決；因此，當曹丕剛剛得知被立為太子的時候，他大喜過望，以至跳起來擁抱一位臣僚。<sup>5</sup>但他的喜悅是短暫的：很快，他就意識到權力總是與責任相伴而來，他也必須更加節制個人的嗜好喜樂。<sup>6</sup>在 218 年寫給吳質的信里，曹丕宣告了個人生活中一個章節的結束，也宣布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富有矛盾意味的是，這個時代就是在曹丕宣告它結束的時候才誕生的。

## 二，鄴下游宴

創造“建安”的第二個重要環節發生在兩百年後。謝靈運（385-433），公元五世紀的偉大詩人，以其敏銳的眼光，選中了曹丕對“建安”進行回憶與紀念的時刻，來回憶和紀念建安。在一組題為《擬魏太子鄴中集》的詩里，謝靈運以曹丕以及七子的口氣寫下一系列詩篇，把“建安”作為一個永遠不再的時代進行表現和再現。有意思的是，謝靈運的七子不符合曹丕的版本，而符合陳壽的版本，以曹植代替孔融。這恐怕是因為曹植作為詩人的地位在五世紀越發崇高，尤為謝靈運所深深敬服的緣故。

組詩有一篇序言，是以曹丕的口氣寫下的：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游夕宴，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

<sup>5</sup> 《三國志》卷 25，辛毗傳，裴松之注，頁 699。

<sup>6</sup> 譬如曹丕不好行獵，在這方面常常受到大臣的諫阻，自從成為王太子以及即皇帝位之後，大臣的勸諫更是變本加厲。見《三國志》卷 2，文帝紀，頁 76；卷 12，崔琰傳，頁 368；鮑勛傳，頁 385；卷 13，王朗傳，頁 411；卷 25，賈潛傳，頁 718。

豈獲晤言之適？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我們在這篇序言的末尾，可以聽到對曹丕與吳質書中“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以及“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的回聲。關於“良辰美景、賞心樂事”的著名宣言，則是謝靈運的個人發明；把鄴下游宴與前代楚襄王、梁孝王和漢武帝及其文學侍從之臣進行對比，從而把“建安”放在歷史特別是文學史中進行定位，更是一個具有公元五世紀特點的現象。不過，這篇序言最突出、最驚人的特點，是謝靈運采用曹丕的口氣。這樣一種戲劇化的手勢，在文學史上真是前所未見的。

當然，很多早期的賦在開篇敘事中都會搬出“宋玉”或者“司馬相如”，但是無論“宋玉”還是“司馬相如”都好像是戲劇中的常見角色一樣，和歷史上的真實人物沒有任何關係，更無論說“宋玉”本來就很可能只是一個傳說人物。我們還可以把《擬鄴中集》的序言和謝靈運的同時代人謝莊的《月賦》作一對比：在《月賦》中，曹植，而不是曹丕，在哀悼應瑒和劉楨之死；為了安慰曹植，王粲獻賦一首。無論是開篇敘事還是賦的正文，謝莊都完全無意摹擬歷史上曹植或者王粲的口氣；唯一符合歷史真實的是一位曹氏公子在哀悼去世的友人，但謝莊把曹丕和曹植搞顛倒了（曹植現存詩文從未對徐、陳、應、劉等人之死表示過哀悼），更不用說王粲先于應、劉二人過世，沒有可能在他們死後向曹植獻賦。

與此相比，謝靈運盡量忠實於歷史，盡量摹擬歷史人物曹丕的語氣，他的組詩、組詩大序以及每首十詩之前的小序，可以被比作一出歷史詩劇。雖然這出歷史劇缺少戲劇性的情節，但是從主角到配角一應俱全。也許用法文的 *tableau vivant*

（中文似乎翻譯成“雕塑劇”或者“活人造型”）來比喻更恰當，這是用一群化裝過的演員選取一個富有戲劇性的瞬間擺出一個造型，不言不語、凝固不動一段時間，是戲劇藝術和繪畫、雕塑、照相藝術的混血產物。當然，《擬鄴中集》里的演員都有發言，但是總體效果靜感大于動感，因為謝靈運的目的不在于呈現一個歷史事件，而在于呈現一幅歷史畫面，畫卷上的七子都被簡化為平面的肖像，謝靈運通過詩前小序和詩本身濃縮他們的生平、揭示每個人最有代表性的特征，而他們的生平和個性則被視為決定了他們詩歌特點的最重要因素。比如說王粲詩前小序：“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再如陳琳詩前小序：“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徐幹詩前小序：“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等等。七子的詩，除了曹植之外，也都具有相似的結構：每首詩都以追敘生平經歷開始，講述詩人如何輾轉加入曹操的幕府，最後以贊美當下的歡宴結束。

《擬鄴中集》給人留下一個印象，就是這些詩好象都是在諸子去世之後由曹丕編輯整理的，而詩前的小序則為曹丕所擬。這樣的安排，不僅響應了曹丕與吳質書中“撰其遺文都為一集”的說法，而且也符合曹丕作為知音者、評論者和批評家的身份。

謝靈運以曹丕口氣編纂“鄴中集”並為之作序的最直接效果，就是這一組詩表現了對建安的後設性回顧。“曹丕”大序的第一句話，“建安末，余時在鄴宮”，非常引人注目。“建安末”這一說法，只能意味著“建安”已經結束了。

且無論這會給我們理解組詩題目中的“魏太子”帶來怎樣的問題（“魏太子”的稱號只能來自建安年間，因為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去世，曹丕即位為魏王，三月漢帝改元延康），這一開門見山把“建安”置于過去的陳述，旨在宣示建安時代的結束，宣示“曹丕”對七子、對建安的蓋棺定論。謝靈運這樣的作法，可以說完全符合歷史上的曹丕，對作為文學時代的建安以及建安七子進行回顧性建構的精神。

謝靈運本人在公元五、六世紀的文學和文化領域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公元五世紀的詩人對建安詩人多有擬作，摹擬的又多是當時的飲宴詩，同時，還出現了對建安時期的浪漫化，比如江淹、謝朓等人都有《銅雀妓》之作。對建安的浪漫化和對銅雀妓這一題材的興趣，固然可以追溯到陸機（261-303）的《吊魏武帝文》，但是建安一代人文學盛名（不僅僅是曹植一個人的盛名）的建立，其直接的根源恐怕還是來自謝靈運借“曹丕”之口對建安的極力推崇（“古來此娛，書籍未見”）和對建安的理想化。而這樣的極力推崇，和五言詩這一詩體在公元五世紀越來越崇高的地位，具有直接的關係。

\*\*\*

創造“建安”的第三個重要環節，也是最後的一個環節，發生在公元六世紀，其中心表現，不是當時的次等文學人物比如劉勰、鍾嶸的《文心雕龍》和《詩品》，而是皇太子蕭統（501-531）主持編纂的《文選》。簡言之，《文選》作為對後代產生巨大影響的文學總集，對“建安文學”的定形與經典化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文選》收錄的建安詩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四類：一，公宴；二，贈答；三，書；四，賡。具體來說，《文選》公宴詩包括了4首建安作品（曹植、劉楨、應瑒、王粲）；贈答詩中包括了17首建安作品（王粲、應瑒、曹植）；書包括6首建安作品（曹丕與吳質書二首、與鍾繇書；曹植與楊修書、與吳質書；吳質答曹丕書），占此類作品四分之一；賡則更是半數以上都屬建安作品（楊修答曹植、繁欽致曹丕、陳琳致曹植、吳質致曹丕）。這些作品的收錄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什麼呢？印象就是一個關係非常緊密的男性文學集團，年輕的公子和侍從之臣相處融洽和諧。這既是蕭梁皇子們效仿的典範，也是他們的著力創造。他們把建安作為一面鏡子，在其中看到的是自己的影象。

順便值得提到的是，《文選》對具體建安詩文的收錄，也很有可能受到謝靈運的影響。《擬鄴中集》里每個詩人名下的擬詩，都有一些詩句或者意象來自歷史上這一詩人的作品，而這些作品也往往收錄在《文選》里。比如“王粲”詩的開篇：“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伊洛既燎煙，函嶠沒無像。整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即是模仿王粲《七哀詩》其一：“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後者收入《文選》卷二十三。“劉楨”詩末句：“唯羨肅肅翰，繽紛戾高冥。”來自劉楨《雜詩》：“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此詩收入《文選》卷二十九。再比如“應瑒”詩以雲中雁起興：“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則是模仿應瑒《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的開頭，收入《文選》卷二十。當然，這未必都是《文選》編者從《擬鄴中集》得到的靈感：劉宋元嘉年間，謝靈運擔任秘書監，造四部目錄，並編有《詩集鈔》十卷、

《詩英》十卷等詩歌選集，這裡所謂“鈔”、所謂“英”，都意味著“精選”。<sup>7</sup> 謝靈運在五、六世紀被奉為詩壇宗祖，他的文學趣味對後世產生影響是十分自然的。

《文選》還收錄了一系列想象與歌詠建安的文。除了前面提到的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之外，還有陸機的《吊魏武帝文》，以及何遜的銅雀臺詩；更重要的是，蕭統對曹丕《典論》中論文的部分加以編輯刪削，收錄進了《文選》並命名為《論文》。刪削的結果，不僅把原本較長較為散漫的章節變成了獨立的單篇作品，而且這一獨立的單篇作品有一個清晰的結構和主題，也就是紀念和評價去世的建安七子，贊美和哀悼一個已經結束的時代，並敦促讀者，也敦促作者自己，以立言的方式，追求不朽的聲名。於是，自從六世紀以來，《典論·論文》就一直被視為一篇獨立的文章，它的其他部分被漸漸忽略和遺忘，最後終於因為《典論》的散失而湮沒無聞，除了一些收錄在類書諸如《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和《太平御覽》中的殘片還在提醒我們：《典論·論文》原本包括了對漢代作家的評價，不全是對所謂建安七子的議論。被编辑整理过的《典論·論文》和其他收錄進《文選》的建安作品還有關於建安的作品一起，在“建安”的形象建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前面說過，沒有建安七子，就沒有作為輝煌文學時代的建安；而如果沒有公元 217 年的瘟疫，沒有徐、陳、應、劉等人的凋零，也就沒有“建安七子”。曹丕的與吳質書，後來收錄在《文選》里，最早界定了作為文學時代的建安。“建安”是一個被浪漫化了的時代，從一開始就產生於傷感的追憶之中。在公元五世紀和六世紀，把“建安”浪漫化的過程得以繼續。建安諸子和曹氏家族在歷史上的真正關係究竟如何，建安作品的完全面貌又是如何，我們今天已經無從知曉；我們所能知道的，只能是曹丕、謝靈運眼中那一個“述恩榮、敘酣宴”的建安，這樣的一種形象，經過《文選》的編輯和整理而傳到後世，被經典化和固定下來。<sup>8</sup>

### 三，飲食政治

“建安”是一個懷舊的建構，從一開始就存在於回憶之中，而“飲宴”則處於這份回憶的中心。譬如謝靈運《擬鄴中集》里面的詩，大多遵循一個相同的結構：先是敘述作者早年遭際以及如何成為曹操的部下，贊美曹操、曹丕的恩德，最後筆鋒轉向當下，以八到十行描寫眼前的盛宴。飲宴之所以對於建安的懷舊性建構如此重要，是建安時代的社會特性和飲宴本身的社會特性所造成的。

研究建安時代的中西學者，多曾指出在這一充滿危險、朝不保夕的時代，宴飲詩反映出一種及時享樂的心理；也有的學者，以為建安公宴詩代表了文學活動的趨於獨立和政治性的削弱；有的學者，以為公宴詩多為社交應酬之作，沒有太高的文學價值。這些見解似乎都沒有觸及早期中古時代的詩歌尤其是公宴詩的本質。在

<sup>7</sup> 《隋書》卷 35，“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 1973 年，頁 1084。《詩集鈔》當從謝靈運編撰的五十卷《詩集》中精選而來。

<sup>8</sup> 譬如說，曹丕的七子當中，孔融被曹操處死。如果沒有這份歷史記載，只看到曹丕在《論文》中對孔融的極力推崇，當不會想到有這樣一段公案。



這一時代談“文學之獨立”或者“文學之自覺”，是一個由來已久的誤區，因為這裡所說的“文學”乃是一個現代的概念，二十世紀的產物，在古代文學里並不適用，尤其是在以宮廷或者王公貴族為中心的早期中古文學里。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以為建安時期“文學”出現了“自覺”，還是指斥“文學”在為“政治”服務，都近于隔靴搔癢。在探討公宴詩的時候，我們應該跳出“文學 / 政治”的二元對立思維模式，把注意力轉向飲宴的社會與政治用途：在社會關係分崩瓦解的年代，飲宴把人們聚集在一起，創造出社區和歸屬感，並且在主公和臣僚之間建立起一種象征性的交換關係。

發生于公開場合的集體宴飲，在一個社會的政治、文化和軍事語境里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研究古希臘宴飲文化的學者 **Oswyn Murray** 認為，在宴飲和戰爭的組織之間其實存在著非常緊密的關係，因為通過儀式化的宴飲，集體消費豐裕的農作物（酒是谷物最好的保存形式），可以使一個社會產生身份認同感和團結力，而這是軍事行動得以成功的關鍵。<sup>9</sup> 曹操首先是一個軍事家，一個能征善戰的將軍，在整個建安期間常常帶兵出征。在出征過程中，大饗將士是不可或缺的：不僅是要滿足武士的口腹，更重要的是在士兵之間創造親密的關係紐帶，也加強他們對官長的忠誠。

公元 215 年春，曹操西征張魯，據《魏書》記載，“軍自武都山行千里，升降險阻，軍人勞苦。”<sup>10</sup> 曹操的樂府《秋胡行》大概就是在這時寫下的，其首段云：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  
牛頓不起，車墮谷間  
坐盤石之上，彈五弦之琴  
作為清角韻，意中迷煩  
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

後來，曹操軍隊擊敗張魯，進入南鄭，盡得張魯府庫珍寶，於是“大饗”，軍人“莫不忘其勞。”王粲此次出征作詩《從軍行》，描述了曹操身處權力中心，重新分配物質資源的舉措：“陳賞越丘山，酒肉踰川坻。軍中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公元 220 年，曹丕即位為魏王之後，操練兵卒，並且在譙縣大饗將士和譙之父老，東晉的史學家孫盛（約 302-374）對此舉大為不滿，認為曹操去世還不到一年曹丕就舉行盛大宴會是不守孝道。<sup>11</sup> 孫盛卻沒有意識到，曹丕是一個技巧高超的武士和獵手，更是一個和他的父親一樣講求實際的軍事統帥，他深知在曹操剛剛去世不久、政治缺乏穩定的時代，宴飲具有穩定團結的重要功能。這次大饗，是曹操本人想必也會贊成的。

<sup>9</sup> 見 William J. Slater 主編，《古典世界中的宴飲》（*Dining in a Classical Context*），密執安大學出版社 1991 年，頁 83。

<sup>10</sup> 《三國志》卷 1，裴松之注，頁 45。

<sup>11</sup> 同上，卷 2，頁 61。

在建安時代，宴飲當然也在非軍事化的場合或者私人場合中進行。但是，在不同文化環境和不同的歷史時期，無論何種宴飲，都具有幾個共同的特點。宴會首先是一個社會性的風俗制度，它把不同的人召集在一起構成一個社區，強調友情、社會關係和文明的價值。正如研究文藝復興時期飲食文化的法國學者 Michel Jeanneret 所說，“餐桌是社會的縮影，溝通交流的理想場所，在這裡，人們交換意見，建立社會紐帶，並學會彼此尊重對方。”<sup>12</sup> 而當主公邀請臣僚赴宴，為他們提供飲食和娛樂，他不僅滿足客人的口腹之欲和精神需求，也展現自己的財富和權力，借此強調主人的社會地位，進一步鞏固臣下的忠心。客人則必須對主人以書面以及口頭言語表達感激，報以赤誠。譬如曹植《筌篲引》中有一聯詩寫道：“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這聯詩完美地表現了主客之間的對等交換關係：主人的禮物似乎是更為實在的，不僅提供飲食，而且以千金上壽（曹植《大魏篇》提到作為主人的君王對臣子“賞賜累千億”）；但客人的回報則具有象征意義的重量，祝願君主千秋萬歲。這使我們想到《詩·大雅·江漢》：“虎拜稽首，天子萬年。”鄭玄箋云：“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當然，在曹植的詩句中，以“萬年”對“千金”，單從數量上來說，已經十倍於主人的投資了。就這樣，客人和主人借助一個交換系統建立起牢固的紐帶：主人提供飲食，而客人則口頭的語言和書寫的文字進行回報。進食的口，同時也必須吐出言語，這是一個把肉體消費轉化為精神消費、把物質轉化為文化的過程。十六世紀的哲學家伊拉斯謨（Erasmus）說，口是既用來吃飯也用來說話的器官。曹氏父子舉行的盛宴不僅要求客人談吐動人，也要求他們寫出辭采優雅的文字。關於前一種類型的言語，曹丕曾經舉行百人盛會，在宴會上出了一個題目請客人分成兩隊進行辯論；<sup>13</sup> 關於後一種類型的言語，則有詩賦的寫作加以驗證。應瑒曾經在公宴詩中寫道：“辯論釋鬱結，援筆興文章。”這最好地概括了公宴上主人期待于客人的兩種話言。

以上歸納的公宴之特點，在建安時期表現尤為明顯。建安完全籠罩在東漢末年的陰影里，這是一個被戰爭和瘟疫分裂得七零八落的世界。王粲著名的《七哀詩》其一，連用了三個“棄”字：詩人棄別中原親友，遠赴荊蠻；在途中，他看到一個饑餓的母親不得不拋棄自己的孩兒；最後，詩人不得不離棄這對不幸的母子，繼續自己的行程。這“三棄三別”，概括了建安時代整個社會的特色：無論家庭關係還是社會關係，都處在分崩離析之中。曹操在公元 202 年發布的一道命令中說：“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悽愴傷懷。”在這樣的時代，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為士人提供的資助和保護代表了合法的安全與穩定；另一方面，如我們所熟知的，曹操提出“唯才是舉”，也在積極主動地尋求有才之士來支持自己的王霸大業。公宴為主公和臣僚提供了一個鞏固加強社會性紐帶和進行象征性交換的理想場合。

#### 四，看待食物的兩種角度

<sup>12</sup> 《文字的盛宴》（*A Feast of Words: Banquets and Table Talk in the Renaissance*），頁 21。

<sup>13</sup> 《三國志》卷 11，邴原傳，頁 354。

主公和臣僚、主人和客人之間的交換關係，有的時候可以變得複雜、曖昧甚至充滿危險。

在其政治生涯中，曹操最喜歡以周公自許。周公的一個特點是愛好賢才，因此有所謂“吐哺握髮”的故事。曹操著名的《短歌行》是一首樂府，很可能是在公宴場合下配樂演奏的；他在其中引用《鹿鳴》一詩，表示對嘉賓的歡迎。詩的末尾提到周公：“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詩人在此沒有言及

“握髮”，當然不排除用韻的考慮，但在一首關於飲宴的詩中特別強調主人之“吐哺”，似乎是在有意暗示嘉賓，主人為了款待貴客而不惜自己挨餓。政治的胃口代替了身體的欲望；主人吐出食物，其回報是得到了天下的人心。

吃飯是不是可以吃飽，對主人和客人有著不同的意義。曹丕的樂府《善哉行》遊戲於主人和客人對待食物的雙重角度，既提出“飽滿”的重要，也暗示“飽滿”的危險：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  
悲絃激新聲，長笛吐清氣  
絃歌感人腸，四坐皆歡悅  
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  
持滿如不盈，有德者能卒  
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  
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  
眾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  
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

詩以典型的宴飲場景開頭，主客酣飲，音樂助興，四坐皆歡。第七、八句突然發生了轉折，一剎那間，好象賓客都消失不見了，只剩下主人獨自一個留在“寥寥高堂上”。“寥寥”在《漢語大詞典》里面的釋義有“空虛”，“寂寞、孤單”，還有“廣闊、空曠”；曹丕這兩句詩就被用來作為例句解釋“廣闊”。但是就算我們把“寥寥”理解為“廣闊”，還是會激發起空曠的感覺；而“涼風入我室”更是讓人聯想到人去堂空、熱鬧已散的情形。

詩人繼續思考“滿”與“空”的關係和它們在飲宴語境里的雙關含義。他提到“持滿”和“不盈”，這裏的潛文本包括《老子》中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或者《荀子》中的“持滿有道”；同時，“持滿”也是“斟酒滿杯”的意思。在曹丕的詩里，客人“飽滿歸”，主人卻“苦不悉”。這一來是說主人的辛苦還沒有結束，呼應前文“君子多苦心”；二來也可理解為主人自己苦於沒有“飽滿”。為了強調主人自己缺乏“飽滿”，詩人特別提到吐哺的周公：“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慊慊”的本義，正是“心不滿足貌，不自滿貌”。主人的“吐哺”和“慊慊”，和客人之“飽滿”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曹丕曾寫過一篇《戒盈賦》，在序言里，曹丕敘述賦的創作機緣：“避暑東閣，延賓高會，酒酣樂作，依然懷盈滿之戒，乃作斯賦。”賦的殘篇尚存，正好可以與此詩對照參看。：“惟

應龍之將舉，飛雲降而下征。資物類之相感，信貫徹之通靈。何今日之延賓，君子紛其集庭。信臨高而增懼，獨處滿而懷愁。願群士之箴規，博納我以良謀。”主人延賓，為客人提供飲食和娛樂；客人則向主人獻計獻策，滿足主人的政治胃口。最後，如果說一個好的主人必須犧牲自己的口腹之欲，那麼如果客人因故不來，主人也同樣食不下嚥，正如曹丕的另一首樂府《秋胡行》所言：“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

任何一種強烈的欲望，無論其對象是賢才也好，還是其他什麼也好，常常用“饑渴”的比喻表達出來。在一封致鍾繇的信里，曹丕如是描述他對一塊美玉的愛好：“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他在《太宗論》里，也曾用“饑渴”描述漢文帝求賢的急切心情：“文帝思賢，甚于飢渴。”在這樣的比喻框架里，如果主人為了盡快接待來訪的賢才而吐出口中的食物，那麼來訪的賢才則在比喻的層次上起到了飲食的作用，滿足了主人的饑渴。

建安七子之一的應瑒寫過一首《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

朝雁鳴雲中，音響一何哀。  
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  
言我塞門來，將就衡陽棲。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  
遠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頹。  
常恐傷肌骨，身隕沉黃泥。  
簡珠墮沙石，何能中自諧。  
欲因雲雨會，濯羽陵高梯。  
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  
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  
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  
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  
為且極謹情，不醉其無歸。  
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在公宴詩中，這首詩獨具一格，其前半部分以擬人手法寫一失群孤雁，這讓人想到曹操《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以烏鵲擇枝而棲，比喻才士擇主而從。應詩的后半部分則完全轉到人事：和失群孤雁不同，詩人找到了棲息之地。他一方面贊美公子對客人的“敬愛”，一方面提醒自己和其他客人以各“敬”其位來報答主人的厚意：“凡百敬爾位，以副饑渴懷。”

在讀到這一結尾的時候，我們突然意識到詩中關於大雁的比喻和此處“以副饑渴懷”的說法很容易把我們帶入危險的闡釋境地。眾所周知，大雁是古時供食用的所謂“六禽”之一，也是獵人最喜歡的獵物之一。東漢崔駰《博徒論》曾寫道：

“鶩雁羊殘，炙雁煮鳧”，也就是文火燉煮的燕子，慢慢燉爛的羊肉，燒烤的大雁，和煮食的野鴨；張衡《南都賦》一一敘述家鄉土產珍味的時候，特別提到“歸雁鳴鵲”。西晉作家張協在其《七命》里也把大雁作為美味之一：“晨鳧露鵲，霜

鷓鴣黃雀。”所謂“露鵠”，是指露水打濕的大雁，因為據說霜露之季節，也就是秋季，大雁是最為肥美的。

曹植有《離繳雁賦》，賦前小序記敘寫作機緣：“余遊于玄武陂，有雁離繳，不能復飛。顧命舟人，迫而得之，故憐而賦焉。”賦尚存殘片，如下：

憐孤雁之偏特兮，情惆焉而內傷。尋淑類之殊異兮，稟上天之休祥。  
含中和之純氣兮，赴四節而征行。遠玄冬于南裔兮，避炎夏乎朔方。  
白露淒以飛揚兮，秋風發乎西商。感節運之復至兮，假魏道而翱翔。  
接羽翮以南北兮，情逸豫而永康。望范氏之發機兮，播纖繳以凌雲。  
挂微軀之輕翼兮，忽積落而離羣。旅朋驚而鳴逝兮，徒矯首而莫聞。  
甘充君之下廚，膏函牛之鼎鑊。蒙生全之顧復，何恩施之隆博。于是  
縱軀歸命，無慮無求，飢食梁稻。渴飲清流。

很巧，這篇賦的殘片恰好結束在飲食的意象上，被放生的大雁，逃脫了在“君之下廚”成為美味嘉餚的命運，得以享受自己的飲食：“飢食梁稻、渴飲清流”。曹植，還有漢代前輩作家，似乎都很喜歡描寫逃生的禽鳥。被系于曹植名下的《野田黃雀行》現在乃是曹植最有名的作品之一：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  
利劍不在掌，結友何須多  
不見籬間雀，見鷁自投羅  
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  
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  
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黃雀和大雁一樣，也是珍饈美味之一。論者多以為這是曹丕登基之後曹植有感于友人丁氏兄弟遭受迫害而寫下的，但實際上類似題材在前代多有表現，比如上一世紀在一座西漢墓中發現的《神鳥賦》，二世紀作家趙壹的《窮鳥賦》。曹植自己曾留下一首《鷁雀賦》，可與《野田黃雀行》相互發明。在此處提到這些作品旨在說明，無論是黃雀，還是大雁，還是鴻鵠，常常在當代詩文中被用來作為自由的象征；而大雁是行獵者最喜捕獲的獵物之一，也最容易從自由的象征變成犧牲品和美食。當應瑒先把自己比作失群的孤雁，又在後文贊美主人對賢人的饑渴時，他作出了一個曖昧而危險的比喻：受到主人酒食殷勤款待的賓客，口腹越是“飽滿”，就越是容易變成滿足主人饑渴的理想對象。他們會被胃口極大、希望得到天下歸心的主人所吞噬，就象石頭給山增高、河水使大海加深那樣，而這也正是曹操在《短歌行》里說的：“山不厭高，水不厭深。”

劉楨寫有一首，《雜詩》表現對處理公事的厭倦，在建安詩歌中別具一格。在詩的結尾，詩人渴望擺脫公務煩擾，和鳬雁一起享受自由：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  
馳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

沈迷簿領間，回回自昏亂。  
 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  
 方塘含白水，中有鳬與雁。  
 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我們想到曹丕《善哉行》的奇特結尾：

眾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  
 比翼翔雲漢，羅者安所羈？  
 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

逃脫羅網羈絆的鳥兒的意象，不僅適用於因為肩頭重擔而憂心忡忡的主人，更適用於主人以美食作為誘餌希圖網羅捕獲的客人。“沖靜”、“自然”是老莊的語匯，它們和這首詩上文提到的周公“吐哺握髮”格格不入。這份矛盾給了這首詩一種深刻的曖昧和複雜性，格外凸顯了曹丕的人性。

## 五，總結

綜上所述，作為文學時代的“建安”，本身是一個具有想象與懷舊性質的文學建構。是曹丕最先把人才濟濟的建安縮小和固定為“建安七子”，這主導了後世對建安的文學想象，主導了文學選本也就是《文選》的取舍；而《文選》的取舍，又是決定了建安的總體形象與建安詩歌經典化、以及哪些詩歌被經典化的關鍵。作為文學時代的建安，從一開始就發生在“回憶”之中，這份回憶的核心，是一場被理想化和浪漫化了的盛宴，而限定了這一回憶的語境，卻是一場盛大的瘟疫，與死亡。